

论《史记》中刘邦人物形象

陈楠淑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在中华文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先秦至秦汉时期堪称思想与文化的黄金时代。从诸子百家争鸣奠定哲学根基, 到秦汉大一统构建文化秩序, 这一时期诞生的典籍不仅承载着历史记忆, 更成为后世学术与思想的源头活水。《史记》作为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 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气魄, 贯通三千年历史, 熔铸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元内容, 既是史家之绝唱, 亦是无韵之《离骚》。它以细腻的人物刻画、跌宕的叙事笔法、深邃的历史洞察,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秦汉社会与精神世界的窗口。

笔者试从《史记》中切入分析, 其中刘邦的多维复杂形象, 展现《史记》刻画的刘邦形象的立体性及其人格魅力。

DOI: 10.64216/3080-1516.25.04.033

1 刘邦形象的神秘色彩与争议性

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 刘邦的性格不是平面化的, 作为大汉帝国的开创者, 刘邦不是单纯的。历史上的刘邦本是一个复杂之人, 再加上太史公的如椽之笔, “不虚美, 不隐恶”同时又抒发自己悲愤之情, 所以其展现出来的刘邦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呈现出不同的形象。^[1]

《史记·高祖本纪》对刘邦的人物塑造, 从外貌刻画便充满神秘色彩。文中以“隆准龙颜, 美须髯, 左股七十二黑子”^[2]的描述, 赋予其异于常人的体貌特征, 尤其是“龙颜”之说, 暗合传统观念中帝王之相的象征。这一特质在吕公眼中更成为预言的依据, 其断言“臣相人多矣, 无如季相”, 并主动提出联姻。但彼时刘邦仅是沛县泗水亭长, 其市井习性——诸如与吏卒调笑取乐、沉溺酒色等行为, 与吕公口中的“贵相”形成强烈反差, 这也使得吕媪因女儿下嫁“无赖”而极力反对。可见, 刘邦早期的特殊面相虽引发少数人的关注, 却未被主流社会认可。

与外在形象的神秘色彩不同, 刘邦早年的行事风格更显世俗化。他在亭长任上不拘小节, 常以戏谑态度对待下属, 且生活作风颇为随性。这种“市井无赖”的形象, 不仅与贵族阶层的礼仪规范相悖, 也与传统对贤君的期待大相径庭。吕公的预言与刘邦现实表现间的矛盾, 恰折射出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与命运的戏剧性。

历史的转折往往孕育于时代危机之中, 就像我们常说的“时势造英雄”。秦末暴政致使民生凋敝, 大规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土壤。而刘邦早

年在咸阳服徭役时, 目睹秦始皇车驾的威严, 一句“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慨, 意为“大丈夫就应该像这样(指像秦始皇这样的气派)。”显露刘邦潜藏的政治抱负——身为九尺男儿, 必定要闯出一番天地。故当秦末乱世的风云骤起时沛县父老的拥戴、地缘优势最终将这位出身平凡、饱受争议的亭长, 推向了改写历史的舞台。神秘面相带来的命运伏笔, 与早期争议积累的生存智慧, 共同熔铸为他成就帝业的独特资本, 使刘邦的崛起之路成为传奇与现实交织的历史奇观。

2 刘邦的性格蜕变与政治进阶

自投身反秦起义的洪流, 刘邦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早年浪迹乡里的散漫习性, 在残酷的战争与权力博弈中逐渐褪去。他深刻意识到, 唯有重塑性格、收敛言行, 方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例如, 当刘邦率先攻入咸阳, 面对秦宫的珍宝美人, 他本能地想据为己有。但经樊哙、张良力劝后, 他克制住贪欲, 封存府库, 还军霸上, 并推行安民举措。这一转变不仅展现出他自我约束的能力, 更彰显出政治智慧的萌芽。

秦朝覆灭后, 项羽自封西楚霸王, 将刘邦分封至偏远的汉中为汉王。面对明显不公的安排, 刘邦并未意气用事, 而是选择隐忍不发。他对项羽假意顺从, 助长其骄狂之心, 暗中却积蓄力量, 上演了一出堪比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蛰伏戏码。此时的刘邦, 已从起义初期的成熟稳健, 进阶为深谙韬晦之道的政治谋略家, 这种能屈能伸的特质, 成为他区别于项羽的关键所在。

楚汉之争的四年间, 刘邦与项羽展开了激烈的军事

与政治较量。这场博弈的序幕，早在“鸿门宴”时便已拉开。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将这一事件置于《项羽本纪》而非《高祖本纪》中，从侧面反映出司马迁的叙事匠心。当时，刘邦违背与项羽的约定，绕道先入咸阳并封锁函谷关，引发项羽震怒。面对大军压境的危机，刘邦在项伯密报后，果断采纳张良计策，亲自赴宴谢罪。宴会上，他强压内心的恐惧，以谦卑姿态麻痹项羽，巧妙化解杀机。樊哙那句“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既是情急之下的脱身之计，也暗合刘邦审时度势、不拘小节的行事风格。最终，刘邦在众人协助下虎口脱险，回营后立即诛杀叛徒曹无伤，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决断力。正如范增在事后的哀叹“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刘邦的隐忍、善谋与果决，早已预示了这场权力之争的最终走向。

3 刘邦的用人智慧与性格悖论

在谈到秦末至汉初这一段历史时，人们经常将刘、项对举，同是作为反秦义军的代表、逐鹿天下的弄潮儿，贵族和布衣、残暴和仁义、勇者和智者、成功和失败这一系列对比鲜明的词语都曾冠在二人身上，而围绕他们争夺天下展开的楚汉战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对决：人们对比项羽、刘邦的性格、品行，评鹭楚汉集团的强弱、胜负，臚列双方的功过、得失；人们既为仁义战胜残暴、勇力不敌智慧的历史规律而感慨，又为布衣终为天子、英雄走向末路的历史现象而唏嘘。

相比于项羽的显赫家世及武勇，刘邦是不可能以一己之力与之相抗衡的，之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江山，要得益于他的选贤用能、虚心纳谏。看起来好像刘邦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身边却聚集了众多的文臣武将、贤才名士，如韩信、萧何、陈平等，后来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的拼搏效力，刘邦才能在激烈的角逐中占据胜场。^[3]

在楚汉争霸的血火淬炼中，刘邦的用人策略与性格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楚汉战争始于公元前206年，止于前202年，在历史上长达五年时间。楚汉战争是西楚霸王项羽、汉王刘邦两大集团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包括了暗度陈仓、彭城之战、成皋之战、井陘之战、垓下之战等著名战役。涉及到的人物众多，影响大，引起了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广泛关注。司马迁善于写战争，陈辽在《论〈史记〉对我国古典军事文学的杰出贡献》一文中认为《史记》在我国古典军事文学发

展史上达到了第一个高峰。^[6]当他以汉王身份在汉中韬光养晦时，求贤若渴的姿态成为凝聚力量的关键。韩信初入麾下时不过是默默无闻的执戟郎，因夏侯婴慧眼识珠、萧何月下追贤，刘邦竟打破“非贵族不拜将”的传统，以筑坛拜将的隆重仪式，将军事指挥大权托付于无名小卒。这种敢赌未来的魄力，不仅让韩信感怀知遇之恩，更向天下释放出“唯才是举”的强烈信号。陈平盗嫂受金的负面传闻、黥布曾为囚徒的卑微出身，都未能阻挡刘邦破格任用，这种超越时代的用人胆识，使张良、萧何、韩信等人才如百川归海般汇聚麾下。

夺取天下后的洛阳南宫之宴，堪称刘邦用人智慧的高光时刻。面对将领们将胜利归功于“与天下同利”的粗浅见解，刘邦直言不讳地剖析：“张良能在营帐之中谋划决胜千里，萧何可使后方稳固粮饷不绝，韩信擅于统领百万大军战无不胜。此三人皆是人中龙凤，而我最大的本事，便是懂得让他们各展所长。反观项羽，空有范增却不能用，岂有不败之理？”这番坦诚自白，既彰显了他对人才价值的深刻认知，也道出了“团队协作胜于个人英雄”的领导哲学。在论功行赏环节，面对群臣对萧何位列首功的质疑，刘邦以“功人功狗”的精妙比喻，将萧何比作发现猎物、指挥全局的猎人，而诸将只是追逐猎物的猎犬，生动阐明了后勤保障与战略统筹的重要性，最终说服众人。

然而，权力的游戏往往会撕开人性的伪装。《史记》在《项羽本纪》的旁逸斜出中，暗藏着对刘邦性格阴暗面的犀利刻画。彭城之战溃败时，生死关头的刘邦为加快逃亡速度，竟三次将年仅十岁的刘盈与鲁元公主推下马车。这种违背人伦的举动，与他平日里礼贤下士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更令人震惊的是，当项羽以烹杀其父刘太公相要挟时，刘邦竟以“我父即你父，煮好后分我一杯羹”的戏谑回应。这种近乎无赖的话术，虽被后人解读为瓦解项羽心理战的策略，但也暴露出他在极端情境下，能够将亲情伦理弃若敝履的凉薄心性。

4 刘邦的帝王猜忌与功臣悲剧

刘邦称帝后的猜忌嗜杀，历来饱受争议。建立汉朝后，他迅速展开对异姓诸侯的清洗：登基首年十月，燕王臧荼因谋反罪名被诛；十二月，韩信遭人告发图谋不轨，旋即从楚王贬为淮阴侯。正如古谚所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句宿命般的讖语，恰是刘邦集权之路的真实写照。

以韩信的悲剧为例，其命运轨迹的转折充满戏剧性。早在楚汉对峙时，刘邦与韩信曾有过一番意味深长的对话。当刘邦询问“我能统率多少兵马”，韩信直言“不过十万”，又自夸“臣则多多益善”。这番恃才傲物的回答，或许早已在刘邦心中埋下猜忌的种子。即便韩信急忙补救，强调刘邦“善将将”的领导天赋，仍未能消解帝王的戒备。随着韩信被贬后称病避祸却难掩锋芒，最终被逼谋反，连同彭越、黥布等异姓王相继被翦除。就连萧何、樊哙等心腹功臣，甚至女婿赵王张敖，也因各种事由遭到猜疑打压。这种对功臣集团的系统性清算，本质上是封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

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独特的“互见法”，上文也提到过，即通过分散于不同篇章的叙事，立体呈现刘邦的复杂形象。《高祖本纪》以编年体记录他平定诸侯叛乱的过程，简洁勾勒出汉初政治格局的动荡；而在《淮阴侯列传》《黥布列传》等篇章中，则通过具体事件的细节描写，揭露其多疑嗜杀的性格侧面。这种笔法既保持了帝王传记的威严，又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还原历史真相，印证了扬雄“太史迁，曰实录”的评价。

5 结语——刘邦形象的文学史意义

刘邦人物评论研究意义重大。一方面，刘邦形象的产生、演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割裂开来的，而是随着朝代更迭、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着的，不同历史时期对刘邦形象的接受呈现出不同特点。另一方面，考虑到刘邦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把握其人物形象，有助于我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更加深入地了解 and 评价刘邦其人。^[5]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首位被全面解构的平民帝王，刘邦的形象突破了先秦史传“圣人化”或“妖魔化”的二元叙事模式。相较于《尚书》中尧、舜的完美形象，或《左传》中郑庄公的权谋刻画，《史记》中的刘邦以“市井气”与“帝王心”的杂糅，开创了历史人物文学书写的新范式：他既能在“约法三章”中展现政治智慧，又会在“分我杯羹”中暴露人性弱点；既需要“君权神授”的神话包装，又无法掩盖“起于细微”的平民底色。这种复杂性叙事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班固《汉书》

虽强化了刘邦的正统性，却仍保留了《史记》中“好酒及色”的细节；唐代传奇《高力士外传》对帝王私密生活的书写，宋代话本《前汉书平话》对刘邦市井形象的演绎，皆可视为《史记》叙事传统的延续。

更深层的文化意义在于，司马迁通过刘邦形象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历史阐释框架：当平民以“非贵族”身份登上权力巅峰，“君权神授”的传统伦理与“实力至上”的现实逻辑必然产生剧烈碰撞。这种碰撞在文本中表现为多重悖论——神化面相与市井习性的冲突、求贤若渴与兔死狗烹的转变、“大丈夫当如此”的政治抱负与推子女下车的人性幽暗，而这些悖论恰恰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隐秘密码。

从文学史角度观之，《史记》对刘邦的书写开创了“历史人物诗学”的先河——当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功绩罗列，而成为人性在权力场域中的试炼场，文学便获得了穿透时空的思想力量。这种力量在刘邦形象中具体化为：他既是“封建帝王”的原型，又是“平民英雄”的异数；既是历史规律的服从者，又是时代规则的改写者。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胆识，让这位布衣帝王在神坛与泥沼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恰是中国文学对“真实”的终极诠释——正如咸阳街头那声“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慨叹，既包含着对权力秩序的憧憬与挑战，也暗藏着人性在历史洪流中永恒的挣扎与超越。《史记》因此不仅是汉代的历史镜像，更成为中华文明理解“人”与“时代”关系的永恒范本。

参考文献

- [1]张庆红.从《史记》到“史记戏”[D].东南大学,2020. DOI:10.27014/d.cnki.gdnau.2020.002692.
- [2]《史记·高祖本纪》载
- [3]徐小娜.明代项羽、刘邦接受研究[D].郑州大学,2022. DOI:10.27466/d.cnki.gzzdu.2022.000041.
- [4]单丽倩.唐代诗文中楚汉人物评论资料整理与研究[D].郑州大学,2019.
- [5]单丽倩.唐代诗文中楚汉人物评论资料整理与研究[D].郑州大学,2019.
- [6]靳希.《史记》人物故事的戏剧重构[D].陕西师范大学,2017.